

赴日考察暨研商學術合作報告書

楊正寬
陳文添

壹、緣起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收藏數量龐大且珍貴之日治五十年治臺第一手檔案史料近三萬卷，且隨著精簡政府層級措施，前報經省府核定，訂定辦法請原省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事業單位等，將在民國五十七年以前之永久保存檔案，包括所有日治時期以及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檔案全數移交省文獻會保管。為妥善保存這一大批貴重檔案史料，改善典藏環境，並確實作好整理工作，以提升臺灣文獻學術成果，擴大且加強對各界服務功能，使臺灣歷史文化園區成為一設備完善之歷史文化典藏、研究、記錄的場所，以彰顯臺灣史蹟源流、落實鄉土尋根，貫徹政府文化建設之政策，報請核准在本年派員赴日本公文書館考察檔案管理體制，擷取其長處以供借鏡。至本年六月，在舉辦臺灣總督府檔案整理研究成果國際學術研討會後，接獲日本奈良縣天理大學臺灣學會參加年會邀請函。之後，和省文獻會簽訂有學術合作協議書，共同研究出版完整「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的名古屋市內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佐保雅子女士，也來函要求撥冗赴該研究所，共同協商在八月份訂定學術合作協議書事宜。驟接此信函，實震驚於事態的突變。六月時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期在七日到九日，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檜山幸夫教授，除發表論文外，並曾要求就此問題進行協商，故會同洪敏麟顧問及會內同仁，雙方協商結果就八月份簽訂新合作協

議書達成共識，雙方同意以八十六年協議書為藍本，不修改內容，在八月八日由雙方代表人在省文獻會舉行續約之換約儀式。而佐保所長竟要求再度進行協商，代表著在八月雙方續約將有變數。回顧省文獻會及中京大學社科所訂定學術合作協議書已有九年，共同編印出版的「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在國內、日本的評價極佳，受到學術界大多數人員的肯定。如此有意義的學術活動，萬一就此中輟，實乃我研究臺灣史人士的損失。考慮情況，雖當時省文獻會係面對未來歸屬的重大局面，仍決定應邀赴奈良天理大學臺灣學會，瞭解日本學術界研究臺灣的現況，建立雙方連繫管道，並抽暇考察日本博物館、文書館整理、展示等具體作法，以做為業務上之參考。並預定在七月五日下午之前趕赴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說明省文獻會為何堅持沿用八十六年學術協議書內容的理由，且以誠心表示對於此項學術活動的合作誠意，希望能夠在八月時完成換約手續。乃趕辦報告省府由研究員陳文添陪同赴日之諸項手續、訂購赴日機票，在獲得省府同意後，終於在六月三十日成行，預定在七月六日回國。

貳、參加天理大學天理臺灣學會學術研討會

一行二人於六月三十日上午出發赴中正國際機場，搭乘長榮班機抵達大阪外海關西國際機場，下機通關後乘坐南海

電鐵特快車抵達大阪府鶴橋市，再於此地轉乘近畿鐵道電車赴天理車站。下車後搭計程車赴天理大學本部，承本部職員好意，搭其私人轎車赴投宿之處。中途竟而發現日本有名的石上神宮就在距住宿處步行可達的地點，乃在安頓好行李後，步行到石上神宮，希望能親眼一睹被指定為國寶的七支刀。

石上神宮主祭神是神武天皇東征時，在今熊野地方得到的神劍，神武天皇建國後神劍送給物部氏遠祖。物部氏和大伴氏、佐伯氏是日本古代在朝廷中代代從事武職的三大家族，大和王朝時期物部氏和蘇我氏相抗衡，在聖德太子當政時，一族首腦物部守屋大連被殺，一族才退出中央政治舞臺。考證石上神宮附近地區，應是物部一族主要居住地。依記載此神宮曾收藏極多武器、神寶以及朝鮮半島諸國送日本皇室之寶物。因常遭盜賊窺伺，石上神宮乃將之埋於地下。所以原本石上神宮只有拜殿並無寶物殿之設。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年）在傳說之埋寶地進行挖掘，果然挖出神劍一把及鈴、勾玉等物，以及鐵製古盾牌、鐵刀諸物。在該神宮，其最特殊寶物是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的七支刀。七支刀相傳是百濟國王「朝貢」品，這一把刀除主刀刃外，另在左右方各鑄出三刀刃，共有七刀刃，故名七支刀。其造形極特殊，刀身上且鑄有漢文文字，但卻是用漢字表日本語音，在日本語音學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故亟思能一睹寶物。進入石上神宮參拜道路，兩旁古木蒼鬱，潮溼的石製燈籠、水溝旁石頭不少都生出濃綠青苔，令人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黃昏時的石上神宮陰鬱、灰暗，詢之管理人員表示今日展示時間已過，且該七支刀係為不公開之收藏品云云，乃在參觀周圍景

觀後賦歸。

參拜道上見識到諸多日本人虔誠信仰神道的一面，不少人，他們口中喃喃有詞，合手參拜，虔誠之情溢於言表。深感日本神道信仰儘管已不像戰前之大肆宣揚，但它卻已深入日本人心。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萬一宗教受到有心人士之利用或誤導，委實堪慮。

是夜宿於天理大學供貴賓住宿之第三十八號建築物，臺灣來的參加人員皆夜宿此處，天理臺灣學會會長塚本照和先生也特別來此處問候並致謝意。雙方談及研究臺灣史的大家，已故天理大學中村孝志教授都不勝唏噓。中村孝志教授，就讀戰前的臺北帝大，在學期間即在臺灣總督府發行之月刊雜誌「臺灣時報」發表論文，後入滿州鐵道附屬大調查機構——東亞經濟調查局，被派往荷屬印尼進行調查，戰後回日本為天理大學教授，曾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館公文書、省文獻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檔案、圖書資料，在同為天理大學校內研究團體——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所發行刊物「南方文化」上，發表諸多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華南興建鐵路、建醫院、設學校等經營措施，以及在福建、廣東設立據點、發展勢力的論文，他同時也是戰後著眼「臺灣籍民」問題的先驅研究者之一。哲人其萎，之後「南方文化」刊載臺灣研究論文即大為減少，實感遺憾。

翌日即七月一日，因天理臺灣學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係在下午一時三十分舉行，乃利用是日上午，赴奈良公園內有名之興福寺及奈良國立博物館進行考察。興福寺是日本奈良南都七大寺之一，以經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的五重塔知名，其中也收藏諸多國寶級文物。其所以如此，這是因為興福寺

是日本最大貴族——奈良、平安時代的藤原氏一族的宗廟有極大關係。日本藤原氏一族之祖名藤原鎌足，生於西元六一四年，原姓中臣，歷代中臣家皆掌祭祀為業。西元六四五年，中臣鎌足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輕皇子（後來的孝德天皇）等共謀，在宮殿刺殺掌權蘇我氏首腦，乘機打倒蘇我氏，擁立輕皇子為孝德天皇，形成日本古代大化革新的原動力。但中臣鎌吉一生和中大兄皇子關係最密切，極多鞏固權勢密謀都由鎌足、中大兄皇子研擬並付諸實施，包括孝德天皇父子都因是中大兄登基障礙，而被無情抹煞。及至日本出兵朝鮮半島，兵敗白江口，女帝皇極天皇病死九州，中大兄皇子不得不踐位力撐危局，是為天智天皇。在位的第八年（六六八年），鎌足罹重病，夫人鏡女王為祈禱鎌足得以痊癒，乃發願建立佛殿，初稱「山階寺」這就是興福寺的前身。曾隨遷都而寺址亦有變動，約在西元七一〇年始在現址陸續興建佛寺等各項建築。鎌足本人是在西元六六八年十月十六日離開人世，在前一天天智天皇授與「大織冠」和大臣之位，並賜姓藤原，這是藤原氏的起源。

而興福寺建立之後，陸續興建金堂、東金堂、五重塔、西金堂、講堂等，都安奉有諸多大型佛像，而從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一直到明治維新之前，興福寺內另有「子院」這種組織，安放較小型佛像。明治維新後，一時之間崇洋風氣極盛，社會充滿否定過去的風潮，所謂「廢佛毀釋」運動盛行日本全國，現在指定為國寶的五重塔都被出售，商人擬焚毀取得金屬，因週遭居民害怕火勢延燒至民房，故加以反對而得以倖存迄今。諸多的「子院」也都被拆毀或出售，只留下少數小佛像供瞻仰而已。今日的奈良公園，原都是興福寺所

有地，常常在依據文獻考證進行考古挖掘、調查，或在整修興福寺各建築物時，有貴重文物出土。而在明治初期隨意毀棄之門、廊以及其他建築物，在時空轉移下竟需在諸多經費配合之下，進行漫長的挖掘、調查作業，目的只在於瞭解當時的實際狀況，並要設法加以保存或進行恢復原貌的工程。

在參觀興福寺後，趕赴同在奈良公園內的奈良國立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之設立可追溯至明治二十二（一八八九）年設置之帝國奈良博物館，其正式開館和臺灣割讓日本之年相同，都是在西元一八九五年。一九〇〇年和東京、京都博物館共同在名稱前加帝室二字，改名奈良帝室博物館。在二次大戰後的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始由宮內省交還文部省，一九五二年才改為今日的名稱。館址在奈良公園內，作為展示用的場所可分本館、東新館、西新館三處，是收藏、研究、展示日本佛教美術的最權威機構。收藏之日本佛教美術品有一二三四件，接受保管者一七〇〇件。收藏圖書包括日文書四萬五千冊、漢文書四千冊、洋文書一千冊。其下附設有佛教美術資料研究中心、文化財保存修理設施。前者主要是作為圖書室及收藏佛教美術資料並提供利用之機構，後者則是修理文化資產的地方。

在參觀途中，幸運遇上該博物館義務解說員倉田秀昭先生，其本人亦是奈良佛像雕刻師，靠倉田先生的說明，得以對於日本佛像發展史有了基本理解。日本本國石佛雕刻並不發達，最初的奈良時期以金銅佛為主流，後來中國傳來塑像、乾漆使用法。中國來日本的雕刻家發現日本有好木材適合雕刻，乃以石雕手法雕佛像，初期利用整塊木材進行雕刻，卻因之易有裂開現象。將刻佛像木材內部挖空的作法是

日本人發明的，可避免佛像乾裂及減輕重量。從八世紀末到九世紀初，日本已完全採行木雕佛像，金銅佛、乾漆像已不製作，平安時代確立了木雕佛像的技術及樣式。他也說明佛像依層次可區分為如來、菩薩、明王、天四大類，各有不同姿勢。

倉田先生並說明奈良國立博物館展示部分及機械控制室之建築物係完全分開。離開該博物館後，本想再到附近之世界最大木造建築——東大寺供奉大銅佛之大佛殿，或是附近和藤原氏淵源亦極深之春日大社進行考察，但時間都不許可，乃儘速趕赴會場。

有關天理大學的臺灣學會，其全名稱爲天理臺灣學會，設立於日本平成三年（一九九〇年）三月，該學會事務所設置於天理大學中國學科之內，設立目的是要推展臺灣的研究，爲達此目的，每年舉辦一次研究大會、定期發行研究機關雜誌、並不定期舉辦研究會、演講會、講習會等，同時也和日本國內外各研究機關進行研究成果的交換。本次研討會計分特別紀念演講會及論文發表兩部分，訂定之日期、順序、時間如下：

日程表

第一日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天理大學研究大樓第二棟、天理參考館

〈研究大樓中國學科共同研究室〉

特別紀念演講會：七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三時四十五分

國分直一〈梅光女學院大學〉：下午一時三十分—二時三十分

講題：懷念的臺灣研究——臺灣研究今昔
曹永和〈中央研究院〉：下午二時四十五分—三時四十五分

講題：從海洋歷史看臺灣

之後爲參觀天理參考館及懇親會（成功大學林瑞明先生演說）

第二日二〇〇〇年七月二日天理大學研究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上午：論文發表（上午九時報到，發表會九時三十分—十二時十分）

林欣儀〈大阪大學研究所〉：「從社會變遷看臺灣語言使用現象——以使用國語和閩南語爲中心」

評論人：前田均

王曉芸〈廣島大學研究所〉：「以阪口鈴子之『時計草』爲中心」

評論人：垂水千惠

許均瑞〈大阪大學研究所〉：「臺灣的村上春樹現象」

評論人：垂水千惠

市川信愛〈天理大學〉：「臺灣華僑和金門幫——以金門出身長崎華商「泰益號」之家鄉調查爲中心」

評論人：下村作次郎

下午：特別座談會（下午一時三十分到四時三十分）

題目：「臺灣、民族、宗教——特有文化採集及其共同性」

研究發表
黃智慧〈中央研究院〉：「臺灣原住民族宗教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官方、學界傳統的形成與對立」

佐藤浩司〈天理大學〉：「二種不同型態的靈媒」

松澤員子〈平安女學院大學〉：「臺灣原住民特有文化採集及其共同性之最近研究動向」

鄭正浩〈鹿特丹清心女子大學〉：「臺灣民間宗教的傳承和變化」

張良澤〈共立女子大學〉：「臺灣文化建設之方向」

河原功〈成蹊高等學校〉：「臺灣原住民的悲哀——從日本文學作品觀察所得」

七月一日上午抵達會場時，發現第一場竟是由我國曹永和院士正在發表演說，原因應是國分直一教授因故遲到。曹院士演講要旨是臺灣為東、南海連接點，也是地控東北亞、東南亞樞紐，澳洲學者認為臺灣是民族擴散根據地。而臺灣島內長期保持純粹的民族性質是一世界少見的情況。在「倭寇」橫行海上時間，臺灣為日本、明朝進行貿易之地。在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取得澳門，荷蘭也想取得該地但被擊退，乃退而取澎湖，和明廷發生衝突，明廷要其退往非明屬土，乃轉向取得明廷未收入版圖的臺灣。荷蘭取得臺灣，可阻斷日本、葡萄牙貿易，而且可以控制由華南地方出發為取得白銀，而往西班牙屬地呂宋島進行貿易的「戎克船」，所以臺灣成為荷蘭重要屬地。荷據初期，在臺灣北部尚有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勢力存在，和信奉基督教的荷蘭形成對立，這也是臺灣特殊地理位置所形成的現象。

而將荷蘭勢力逐出臺灣的鄭成功，其父鄭芝龍曾為荷蘭艦隊翻譯人員，亦為見風轉舵能手。歷事荷—明—清。清廷入主中原，海上霸主鄭芝龍降清轉往陸地，其主要原因在於保護龐大家產。未投降的鄭成功續留海上，則是為了保護鄭

家海上的貿易特權，而未隨同入北京。在巔峰時，勢力遠達南京城下。退回華南時，遇清廷政策攔阻，難以展開貿易，為建立海上王國，須尋找代替廈門地位的地方，乃著眼臺灣，來此地驅逐荷蘭勢力。至於施琅在大陸被認為是解放臺灣的英雄，實則是利用身分，有意取得廈門、琉球間貿易利益者，在父親、弟弟被鄭成功所殺，乃投降清廷。諸多新鮮說法，讓人眼目一新，期望能儘快一讀其完整演講辭。至於國分直一老教授，年齡已逾九十，八十七年八月來臺南縣時，仍精神奕奕，此次再見面，因是在罹病手術之後，已須以輪椅代步了。且體力不繼，大多數由早年在臺灣研究民俗、考古頗有成就之金關丈夫哲嗣進行說明，再向國分教授求證或作補充而已。其他七月二日發表人則大多數以現在臺灣的各種情況作為研究主題。

七月一日在二位大師演講會結束後，參觀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館內蒐集中國大陸、南北美洲、東南亞、非洲等地的民俗資料，以及古代中國、埃及、東方地區、日本的考古資料為數甚多。其中臺灣原住民、平埔族資料不在少數，曾經在一九九八年舉辦特別展，展出各種型態、色澤的紡織品，並出單行本作為紀念。夜晚臺灣學會舉辦由研討會參加人員始能出席的懇親大會，採自助餐方式。

席上受邀作特別演講，乃敘述今天得見在日本研究臺灣之諸多先進學者，深感榮幸，臺下人員以熱烈掌聲回應。緊接著說明省文獻會收藏日治時期檔案情況，也敘述日本學者來利用者甚多，六月舉辦研討會，承交流協會贊助，深為感謝。希望在座各位學者，能撥冗蒞臨指導並利用省文獻會資料，以期臺灣史的研究能夠日趨蓬勃。與會人員頗表贊許，

更想不到的是交流協會竟亦有職員在座，演講完畢下臺後立刻趨前來表示謝意。接著臺灣、日本學者都來詢問省文獻會檔案如何利用的問題。發表論文之市川信愛副教授當場表示要來省文獻會查閱族譜關係資料，另有大川敬藏先生希望能代查是否有其祖父經營之植松材木行相關資料。懇親會在熱烈氣氛下，約於夜晚八時始告結束。之後承在該校任教之我國學者沈文良先生盛情，夜訪天理教本部神殿，神殿皆以檜木建造，迴廊繞行一週共有一公里長。在夜晚仍有甚多義務工作人員，屈身以抹布仔細清潔迴廊，信仰的力量實在驚人。翌日在聆聽各篇論文報告後，該校校長邀請省文獻會來賓二人及中研院黃智慧小姐、成大林政明先生，由天理教國際部部長、下村作次郎教授等人陪同，在該校招待貴賓之餐廳共進西式晚餐，盛情感人。

參、參觀平安神宮及考察京都府立綜合資

料館

七月三日晨，離開天理大學後，搭電車轉赴京都，京都日本最有名古都，因市內平安京舊宮殿並未開放，故選擇參觀平安神宮並考察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

平安神宮是京都市有名古蹟景點，為紀念遷都平安京一千一百年，在西元一八九五年興建，年代同於臺灣割讓日本之年。主祭神是遷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最後的平安京天皇——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亦配祀在此神宮內。平安神宮之拜殿和神門，依平安京太極殿和應天門形制，縮小約為百分之六十的比例來興建。拜殿之後及右側仍留存優美日式庭園景觀，但徜徉其間，卻不由得浮現出歷史是勝利者的紀錄

這種想法，一個國政領導者，後人首先追憶的是他做了什麼，對當代有何影響，私德方面就比較少提及了。一如中國漢武帝、唐太宗殘暴嗜殺被其彪炳功業遮蓋一般，桓武天皇本人私德方面也頗有令人不敢苟同之處。

桓武天皇（西元七三七—八〇六），在位期間從西元七八一年到八〇六年，是日本第五十代天皇，即位之時，原有律令政治體制日趨廢弛，和政治關係密切的佛教呈現庸俗化，僧人對政治影響力日增，政界也出現腐敗、萎靡現象。他乃在七九四年遷都平安京，開始了一千以上以京都為首都的時代，本人也成了日本史上平安時代第一位天皇。就政治而言，他厲行各項革新政治，如派出使者監督地方官、實施政治教分離、不許奈良各大寺遷移新京、命令最澄、空海實施佛教改革等皆屬之。而出兵平定蝦夷，鞏固北方國防等，也屬他對古代日本的重大貢獻。然而就私德而言，可供議論之處實在非常之多。即位前的桓武天皇是光仁天皇之子，以母親身分卑微，立為皇太子可能性甚低，乃和藤原一族之藤原百川合謀，先通好井上皇后，後竟密奏皇后招集巫女修法術，欲光仁天皇儘早死亡。如此遭致皇后、皇太子被廢、死亡。而他本身得藤原百川之助，終得立為皇太子。父光仁天皇後來自責不已，臨終之時，強要桓武立弟弟早良親王為皇太子，卻因人性的自私，演成慘劇。原來桓武天皇身旁，早被藤原氏一族所包圍，皇后自亦出身藤原氏，早良親王的存在，形成藤原一族為皇室外戚的障礙，早良親王本身也深怕變成第二個井上皇后，雙方互相猜疑。在此局面下，因為武家出身的大族大伴氏、佐伯氏二族，早年是皇室屏障，以藤原一族的崛起，在朝廷中的勢力大減，亟思有東

山再起的機會，故皆趁機接近早良親王。

西元七八四年，桓武天皇為讓情勢一新，決定遷都長岡，派藤原種繼主持新都興建事宜，翌年八月藤原種繼被暗箭射殺於新工地。給與天皇、藤原一族削弱政敵大伴氏、佐伯氏的機會。下手刺殺藤原種繼者確是大伴一族，卻牽連早良親王，被斷定是主謀者。早良親王先是被拘禁，他以絕食反抗，最後死於流放途中。事件的結果得到最大的好處是藤原一族，桓武天皇也得以立親生子為皇太子。但是世間之事並不能盡如人意，報應來得很快，桓武近親多人相繼在七八八、七八九年辭世，多年來的良心不安，也讓他疑神疑鬼，總覺得被他害死的井上皇后、皇太子、早良親王要找他復仇。因怕惡靈之故，捨棄了已建設多年的長岡新京，倉卒的決定遷都平安，並且追諡早良親王為天皇，赦免大伴、佐伯二族人之罪。現存日本最早的和歌集——「萬葉集」會流傳下來，有一說法就是為了安撫該和歌集總編撰人大伴一族的首腦人物——大伴家持的亡魂。參觀過平安神宮及附屬日本式庭園，懷著複雜心情，離開平安神宮，搭車轉赴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

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設立於昭和卅八年（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廿八日，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開館儀式，十六日起即開始經辦一般資料館業務。出國之前已知悉該館收藏有檔案資料、民俗文物、圖書資料等，頗和省文獻會有類似之處，乃特地赴該館查詢，並探究營運狀況，期收借鏡之效。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附近有植物園、京都府立大學，地勢寬闊，環境幽雅、安靜，有市公車、地下鐵經過，交通稱便。

該資料館收存資料可區分為三大類：

一、圖書資料，現有五十六萬餘冊，又可大略分為(1)有關京都府資料。包括個人、官方有關京都出版品、京都府所屬地方自治單位發行統計書，各類報告書及京都發行之新聞、雜誌類，已製作目錄並每年追補。(2)貴重圖書，京都地區曾為日本首都千餘年，貴重日文、漢文書留存不少。年代久遠，日文書在日慶長年間（西元一六一五年）～，漢文書選在我明朝嘉靖年間（西元一五六七年）以前者列入貴重圖書，以後者則選資料價值高者始列為貴重圖書，且已製作這方面的目錄。(3)美術工藝品及設計圖書資料，京都在日本平安時代之後即是該國繪畫、工藝、雕刻、建築、庭園設計等日本美術史之中心地，為維持傳統染織、陶瓷、佛具產業優良技術及培育新一代創意設計人才，乃採購各類個人難以購買之美術工藝豪華圖書、畫作集、作品集、染織及陶藝類圖錄並收集容易散失之博物館、美術館及各團體主辦之展覽會圖書目錄。上項各種資料也都編有目錄供利用。像片資料則利用購買及接受捐贈方式收集關西地方像片集在一千五百套以上，在大閱覽室特開關像片集專區開架供閱覽。公家機關資料，包括各機關出版、發行之統計、調查報告共在四萬八千冊以上，日本中央政府出版品之「經濟白書」、「環境白書」、「國民生活白書」等皆從創刊號起即已收藏，政府官報也儘量收藏，可惜臺灣總督府官報不在其內，但對日本學者而言，在查閱日本國內各項資料上已極為便利。報紙、期刊雜誌、專利資料，由日本特許廳（專利廳）供應專利資料供查閱，該廳為便

於查閱製作有光碟，故館內也設有閱覽讀取機供檢索、閱覽。戲劇資料，包括海報、劇院演員排名資料、內容簡介等還有電影劇本一千五百冊以上，包括日本電影全盛期的劇本多部，實甚為珍貴。接受捐贈圖書如吉田光邦文庫總計在三萬三千冊以上，左派學者河上肇文庫等亦屬其中之一。

二、檔案資料，包括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全部在二萬卷以上之東寺百合文書及諸多私家文書。像和省文獻會收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類似之行政文書，包括京都府廳文書，這部份是京都府廳內各機構之永久保存文書，在公文辦結後廿五年交該館保存者，經編綴成卷者在二萬七千卷以上，最早的從明治元年開始，現存京都府明治期檔案有三、一四九冊，大正期二、三三九冊，昭和戰前期六、七四五冊，戰後期一四、七九九冊。另外還有保管期限文書，經選定有學術等調查研究價值之資料，仍移交該館保存，稱為「京都府移交文書」有五、五三四冊之多。至於這一方面文書，都在文書閱覽室提供利用。古文書用「古文書閱覽申請書」、行政文書用「行政文書閱覽申請書」提出申請，當然申請前須自行查閱文書號碼、文書名或件名等。東寺百合文書是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之貴重古文書，欲參閱原本，須在有必須閱讀原本的理由及閱覽日兩天前提出，始提供原本供閱，若欲利用微縮影捲閱讀則無任何限制。另一方面，從明治元年起之京都府廳文書、京都府移交文書，只要提出申請則全部提供原本供閱。對此，曾特別詢問是否發生過史料遭破壞情事，主管是項業務

之歷史資料課人員對此詢問，面現詫異之色，搖頭否認。日本學者應極重視己身名譽，一旦有不祥情事，勢難於學術界立足，故也多能潔身自愛，畢竟有愛護使用資料之心，應該是利用者最基本的自覺，此乃不待外界要求也。該館為充實館內文書內涵，便利需要者利用，也將收藏於國立公文書館比較早期的文書「太政類典」在徵得國立公文書館同意後，完全拍攝成微縮影捲供閱，並儘量蒐集有關京都府關係文書，或同樣拍微縮影捲或以影印方式等蒐集之，在製作目錄後提供利用。

三、實務資料，分為美術（日本畫、西洋畫、版畫、雕塑、書法）約二千三百七十件，染織品資料約二、七〇〇件，主要以京都這方面作品為中心，從日本一代名將織田信長活躍期的桃山時代開始以迄現代，作一系列有系統性收藏，也有少數海外染織品及日本國內生產的染織工具。陶磁器約有三、一七〇件，從古清水燒以迄近現代名家陶藝作品都在收藏之列。其中由京燒名門清水家捐贈約三百件清水家收藏品，為了解京燒歷史之貴重陶瓷資料。另外還有漆器資料約一三〇件、木竹金屬工藝資料一五〇件、人偶資料五二〇件、鄉土玩具資料一萬二千餘件、樂器資料一一七件、歷史、考古資料約五〇〇件。這些實務資料所有者仍屬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但在一九八八年委託京都府立博物館管理、展示。現在該館展示以古文書即東寺百合文書為主。京都綜合資料館場，除在館內進行調查、蒐集活動外，並提供圖書、文書等閱覽區供利用，也舉辦古文書講習會，以只徵收用品費方式請專人演說及講解、解讀各時代古文書。個

人也可持古文書請該館職員協助解讀內容等，但對古文書則不加以鑑定或評定其價值。另外在資料館外的調查活動，舉其重要者，包括：東寺觀智院金剛藏聖教調查，金剛藏是名為金剛之倉庫，內收藏自日本鎌倉時代該寺建立後住持書寫佛教教義解說、典籍、文書類，以及該時代手寫佛經等，我國宋版經典亦在其中，該文書館歷時十三年從昭和四十六年（民國六十二年）到昭和六十一年清點、整理共三五八箱約三萬三千件資料，製作成完整目錄。本項工作結束時，該項文書亦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該館另一項重要業務是調查歷代古文書之所在並製作微縮影捲以供利用，本項作業以個人收藏古文書為主，就其內容數量、保存狀況、整理狀況進行調查後，必要文書並作成目錄，請持有者允許製作微縮影捲以供利用。另為製作有關古文書方面之正確資訊基本資料，對轄區內各自治團體擁有之古文書資訊也作了調查。對京都府發行之公報及關連行政文書，其有缺號公報以複製方式補足，公開供利用。為蒐集府廳相關文書，曾有系統的就國立公文書館「太政類典」作了調查後，並徵得該館同意，拍攝全部「太政類典」文書微縮影捲，此已在檔案資料部份保存。京都府下各地方行政機關屢有分合，為瞭解各該行政文書保存情形，防止文書散逸，先請提出各自文書調查結果，必要時進行實際調查，有必要時並製作包括保存地點、狀態及內容、數量的目錄。對京都府內知事所轄各機構保管文書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包括行政、土木工程單位在內，以掌握仍未移交京都府廳文書情況。有形民俗資料調查先

從調查各地區生活的實際狀況著手，選定典型聚落三至四處，就過去生活上使用的工具，調查使用情形、分布、製作法、由來等進行調查，以作記錄保存。在調查過程中取得的資料，該資料館分年附圖，以「京都府之民具」為名，出版第一集「衣食住篇」、第二集「農業和林業篇」、第三集「漁業篇」、第四集「各項職業篇」、第五集「年中行事篇」。

口語傳承調查，日本口語傳承自明治時代後已漸式微，為在滅絕前留下記錄，選定府下三處地方，調查各自民間口頭傳承內容，並印刷發行之。民俗調查、民謠資料不唯是傳達音樂文化傳統之音樂資料，亦是各地人民生活情況之生活文化資料，和省文獻會辦理耆老口述歷史、藝匠口述歷史等有異曲同工之處。

肆、赴名古屋及考察愛知縣公文書館

七月三日下午考察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後，即搭新幹線，於夜晚時分抵達名古屋市。夜宿名古屋東急大飯店，預定在七月四日考察名古屋市內之愛知縣公文書館。名古屋是日本的第三大都市，位在日本愛知縣西北部，也是日本中京工業區的中心都市。名古屋市的發展和德川幕府早期即在此地建名古屋城，名古屋市作為其「城下町」而漸次繁榮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日本戰國時代出名的武將織田信長、德川家康、豐臣秀吉三人出身地都在愛知縣。有名的「桶狹間會戰」，即西元一五六〇年織田信長以寡兵三千，奇襲攻入自身領地內的德川家康岳父——今川義元四萬五千大軍，一舉取得今川首級之地即在愛知縣內。織田信長是天才型武將，

在幾乎一統日本取得天下時，因部下突然叛變，死於京都本能寺。豐臣秀吉繼起統一日本。以出身低微，未開幕府，只以「關白」之職掌朝政。因出兵朝鮮和明朝為敵，大損實力，加以嗣子秀賴年幼，秀吉擔憂其將來，在憂悶中辭世。果然在卒後二年，即西元一六〇〇年，德川家康在「關之原」戰勝親近豐臣氏諸藩軍隊，取得天下。名古屋地方封其四子忠吉，一六〇七年以二十八歲英年病死，乃改封其第九子德川義直，是尾張德川家之祖，和紀州（和歌山）德川家、水戶（茨城）德川家合稱「御三家」，是位階最高的三親藩，有資格入繼江戶（東京）征夷大將軍之職。名古屋城建於一六一〇年，為德川家康在其權勢正盛時，命令當時最有名的築城專家——武將加藤清正興建完成。加藤氏後來亦在封地建熊本城，二者都屬日本名城。完成時的名古屋大城樓上兩邊懸掛有長近二點六公尺的雌雄二隻黃金打造的金鯨魚，代表德川家全盛期的權勢及財力。但原城牆及金鯨魚毀於二次大戰盟軍的空襲，一九五九年始行重建及重新打造。而這名古屋市和名古屋城，和我臺灣的關係也頗為密切。甲午戰後翌年割臺，日本政府任命的臺灣總督府文官最高位首長——民政局長水野遵，即原是尾張德川藩藩士，後由明治政府派赴清國留學。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之役時，也曾來臺視察臺灣狀況。隨樺山總督督來臺之初，他也曾以辦理公使名義，和清廷指派的李經方在基隆外海辦理臺灣島的移交以及和各國駐臺領事進行樟腦、砂糖等臺灣特產品貿易權限的交涉，到第三任乃木希典總督時才黯然去職。而第二任的桂太郎總督、第四任的兒玉源太郎總督，在受任命為臺灣總督之前，兩人都擔任總部設在名古屋城內的第三師團長之職。另

外由兒玉總督進用為民政局長，官制修正後為日本治臺灣史上首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在明治十四年以二十四歲之年，已擔任在名古屋市內之愛知醫學學校校長兼愛知醫院院長。翌年擔任自由黨黨首（總理）的板垣退助，在名古屋演說政黨政治時遭刺客刺傷，後藤趕往為其治療。後藤在明治三十一（一八九八）年來臺任文官最高位的民政局長及民政長官長達八年八個月，留下可觀治績。而板垣退助則在人生晚年的大正三（一九一四）年來臺，鼓吹自由民權運動，籌組「臺灣同化會」。流風所及，臺灣民眾在新一代民間領導人領導下，改採非武裝方式的反抗總督府統治運動。在臺灣史上，兩人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愛知縣公文書館成立於一九八六年六月，當時主要收藏原由愛知縣文化會館等轉交收存的資料，冊數並不多，只有德川幕府時期尾張藩關係文書、郡役所文書二百餘冊以及地籍圖二九八張、地籍簿二一九八張，但這些都是舉世無二的珍貴原本。該文書館在成立後每年都努力收集公文書，永久保存的文書，在經過二十年之後，由縣廳所屬各機關如縣知事管轄部、局、教育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等到期的公文，在該管單位決定銷毀時，經文書館篩選並判斷具有歷史價值公文書，移交文書館保管。這些送來公文書館的永久保存、非永久保存公文書，公文書館須先製作件名目錄、檢索卡片等，原則上在該項公文書辦結後二十年，皆可提供利用，依最新紀錄（平成十一年）顯示該文書館整理竣事，可提供利用檔案卷冊，包括戰前及舊名古屋藩時期檔案共九四三一卷。另外也收集縣廳所屬各機關出版品及接受捐贈，也購買相關所須參考圖書。但該文書館另有比較特殊製作複印

本的作業，主要是針對兩大部分，一項是利用頻率比較高而且有損傷之虞的地籍圖、明治時期縣廳檔案。平成十一年度（一九九八年四月—一九九九年三月）製作地籍圖複製本八十一張，統計共已製作一九〇六張，從平成三年度到十一年度共九年，約只完成所有地籍圖二一九八張的百分之八十七。另外一項製作複製本是針對被其他機關收藏的「愛知縣廳文書」製作複製本。在二次大戰之前的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現在的愛知縣廳竣工，在新遷入之前，決定銷毀諸多的古文書，明治期的公文書大都交給了尾張德川黎明會，這當中有一部分由財團法人德川黎明會德川林政史研究所、國立國文學資料館保存迄今。另外，在日本中央農林水產省所屬水產廳中央水產研究所圖書館處，亦收藏有愛知縣下水產關係檔案。這些機關所藏愛知縣相關檔案，在愛知縣公文書館設立之後，將這些檔案皆拍攝微縮微捲，再藉之製作成複製本提供利用。總計從德川林政史研究所所收藏的「愛知縣廳」部分製作了複製本六六一卷，從國文學資料館收藏「愛知縣廳」部分製作複製本二三七六卷，從水產廳中央水產研究所圖書館收藏「愛知縣廳」部分製作複製本七十八卷，從德川林政史研究所所藏「舊名古屋稅務監督局」所藏史料製作複製本一三九四卷。總計爲了蒐集昭和十三年輕易決定銷毀的文書，費盡心力從攝製微捲製作了複製本共四五〇九卷。對於文書館內收藏之資料，一般性的修復，皆由館內人員自行，進行修復。但受虫蛀等損壞情況嚴重者，則委託外部專門業者加以修復，在去年的平成十一年度共只送出四卷受到虫蛀情況較嚴重的地籍簿而已。可知該文書館內收藏的各項資料保存情況尚屬佳良。經統計愛知縣公文書

館可提供一般人士利用之資料，包括辦結後三十年公文書、其他機關收藏愛知縣廳文書複製本、縣公報、官報、地籍圖及公家出版品共有十一萬七千七百零四卷之多。

伍、在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協商學術

合作協議書續約事宜

名古屋中京大學是在一九五四年，由日本中部地方最大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學校法人梅村學園所設立的綜合大學，下設有文學部（院）、社會學部、法律學部、經濟學部、經營學部、商學部、法學部、體育部等九大學部及各學部之研究所，並設有供一般民眾選擇終身學習的課程一五〇種，現有學生總數（不包括終身學習課程學生）近一萬四千人。校園廣大，分爲名古屋校區及豐田市校區兩大部分。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在名古屋校區，正式設立於一九八〇年三月，距離今天已有二十年，其前身可追溯至一九六八年設立的中京大學綜合社會科學研究所，故前後已有三十一年之歷史。最早的十二年即採自願參加，不受學部（學院）、講座制限制，由研究領域不同研究人員進行共同研究，這期間設定的題目有「南北問題」、「東西問題」、「都市問題」、「公害問題」、「殖民地問題」、「福祉國家問題」、「近代化論」、「宗教問題」等，這段期間舉行一百二十次的研究會，發行機關誌『中京社研』六卷。一九八〇年改組爲大學設立之研究所，其設立目的在於推展專門領域不同研究人員間的共同研究及個別研究，以期有助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同時貢獻地區社會。爲達成此一目的推行的各項業務包括，1．個別研究、2．特定專題之共同研

究、3. 定期研究會、4. 發行紀要、5. 刊行研究叢書、6. 舉辦演講會、講習會等7. 蒐集、整理相關資料、8. 為達成前面七項業務所必要進行事項。社科所置所長一名外可設置副所長一名，研究所最高議決機關是由研究所所員出席召開的所員會議，審議決定研究所組織、所內營運重要事項以及研究活動上之必要事項。原則上在每年二月及四月各召開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所員會議。現有正所員二十七人，重要組織另有營運委員會、大學附設研究所委員會，前者由所長、各研究部主管人員及大學附設研究所委員組成，掌理決定研究所營運事項，後者主要製作計畫書、預算書、決算書以提交大學理事會。

一九八〇年改組後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其初以「美國研究」作為共同研究主題，出版機關刊物也從「中京社研」改名稱為「社會科學研究」，迄今年二月底止，共出版四十期，卷頭「社會科學研究」六字是由臺灣臺南縣出身之該校教授，也是上一任所長吳盛孝先生精心從唐朝石碑上選出的字體，頗有特色。在「美國研究」結束後，社科所內陸續成立臺灣研究部、英國研究部、澳洲、加拿大研究部、俄羅斯研究部四個共同研究部門，成效最著的是臺灣研究部，最大功勞者是現在該所的臺灣研究部主管檜山幸夫教授。檜山教授本人原為研究日本明治時期外交史專家，卻因緣際會變成日本在戰後最先接觸「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學者，浸淫其間前後已近二十年，故深為日本學術界所注目。緣於一九八二年暑假，檜山教授取得日本文部省經費，來臺灣進行日治時期資料的調查，在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得悉當時在臺中市黎明辦公區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收藏日治時期「臺灣

總督府檔案」，乃專程南下調查，確認無誤後，每年都在社科所強力支持下，派遣包括學者、專家、大學生合計三十人以上的大訪問團來省文獻會查閱檔案史料，迄今計出版「臺灣史料綱文」上中下三卷，以及「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六卷。在這當中，檜山教授所領導的臺灣研究團，在臺灣及在研究所內都曾遇上棘手的問題。約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在檜山教授領導下，以收藏於臺灣分館的臺灣史料綱文為藍本，利用省文獻會收藏檔案、日治時期出版之府報、官報等圖書，經詳加比較、勘誤並加以解說，出版了三冊「臺灣史料綱文」之後，因外交部認為將來公開檔案讓外國人閱覽，恐有洩漏國家機密之虞，要省文獻會停止提供檜山教授一行人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在這困難情況下，幸賴當時的社科所所長石堂功卓先生，在德國留學時結識現為司法院大法官的蘇俊雄先生，在當時教育部施金池次長處，代和外交部進行冗長的電話交涉與說明，才取得外交部同意進行檔案目錄之研究。民國八十一年四月，省文獻會在簡前主任委員榮聰率領下，組團赴日本旅遊，並順道參觀中京大學。斯時，擔任社科所營運委員長的吳盛孝先生提議共同編印完整「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一行回國後，社科所再派遣吳盛孝教授、檜山副教授，由當時仍在臺灣大學留學之赤嶺守先生（現為國立琉球大學教授）陪同，和省文獻會進行正式交涉，雙方同意合作，是年八月十日正式簽訂為期五年的學術合作協議書。八十六年八月到期，乃在這年八月八日再度續約三年。

然而，在這階段不唯檜山教授領導的臺灣學術研究團，連母體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都陸續面臨了相當大的衝擊。社會

科學研究所在成立之初，是得天獨厚，中京大學方面亦充分給與支援的單位，但是在校內的中小企業研究所設立之後，從事經濟、經營、商學研究的成員幾乎全數轉移到該研究所，及至大學新設經濟學部，下設經濟研究所，又帶走了一批原社科所研究人員。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人材斷層以及預算不符所需的問題。因每年入學學生數不足，大學給與社科所的預算，原則上不予增加，下設之臺灣研究部，英國研究部、澳洲及加拿大研究部、俄羅斯研究部必須互相爭奪這有限的預算。臺灣研究部為維持營運乃向文部省外圍團體——私學振興財團、豐田財團、交流協會申請補助。從一九九七年四月到二〇〇〇年三月底，則多數仰賴文部省科學研究費提供所需經費。至於所需人材，每年來臺成員則因社科所本身人材不足，研究人員反而是其他大學、研究機構人員占多數，某程度顯現出在社科所臺灣研究部現階段發展上，除經費問題外，也遇有其他的瓶頸。

七月五日下午，名古屋當地時間下午一時之前，乘坐檜山教授車子抵達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員前川漸教授以佐保所長腳部不適代表來迎，之後由前川教授率同大友昌子教授、酒井惠美子副教授、安村仁志營運委員長等人，拜會中京大學小川尚義校長，並參觀啓用尚不滿十年，高度資訊化的中京大學營運中心大樓，館內極為寬敞，大型學術講座、學校各對外連絡窗口都設於此中心大樓，人潮來來往往，卻能不見擁擠難行場面，在設計上頗具巧思。約二時許回社科所，見檜山教授正以相機拍攝古色蒼然的資料，細觀之，乃是明治政府發出之給與伊藤博文的第一號護照，徵得檜山教授同意，也將之拍攝作為紀念。伊藤博文是今日日本山

口縣人，曾四度組閣。甲午戰爭發生於他第二次組閣之時，停戰期間，和外相陸奧宗光在下關和清廷派遣特命全權代表李鴻章談判，簽訂將臺灣割讓日本的馬關條約。省文獻會收藏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內，即保留甚多其本人名義發出之公文書。其後，他在日俄戰爭結束，被任命為朝鮮統監，以推進日韓合併，被韓籍青年安重根暗殺於東北哈爾濱車站。就其經歷及和臺灣的關係，實是一件頗具價值之史料。

在這段期間，社科所與會人員陸續進場，三時正式開會，省文獻會出席人員二人，社科所方面有前所長石堂功卓先生、現所長佐保雅子女士、安村仁志營運委員長、檜山幸夫教授、大友昌子教授、酒井惠美子副教授、吉川仁教授、前川漸教授、蘆田起久雄教授、山田英雄教授諸人與會。佐保所長發言，開宗明義即指出因經費關係，希望修改學術合作協議書部分內容。佐保雅子所長並且具體列出數據，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研究所方面，計對臺灣研究部支出八五九二萬圓，另外從一九八五——一九九四年，文部省外圍團體——私學振興財團處申請取得補助款三九四〇萬圓，一九九七年豐田財團補助八七七萬圓，一九九六年交流協會補助一九三萬圓。在最近三年即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取得文部省科學研究費二七一〇萬圓。易言之，歷年來日本方面在臺灣研究部的支出款項已逾一億六千萬圓。在經費困難情況下，在明年三月底之前出版第七卷到第九卷的「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所需經費六〇〇萬圓，社會科學研究所同意支應。但是從明年四月一日以後，出版該目錄所需經費，希望由文獻會支應。接著所內營運委員長安村仁志

教授發言表示：在現階段每年約只能編纂、出版目錄一卷而已，希望省文獻會方面能夠諒解，並同意修改合約文字。在此困難情形下，乃以誠意說明經費不足的情況，不唯社科所，省文獻會亦面臨下年度預算將被削減的窘境，因未來歸屬仍未明朗（當時），再加上一九九二年初次簽訂合作協議書時，社科所方面同意負擔印刷費用，沿用迄今已歷八年，欲在今日追加本項預算費用，絕非現實情況所能允許。而且就一般情況而言，簽訂新契約書，每次的內容更應該優於以前，中京大學社科所的處境可以體諒，有關所需經費問題，貴我雙方可以合作尋求解決之道。今天爲了表示合作誠意，回臺灣後將查詢相關規定，若屬可行，省文獻會將考慮進用社科所人員，人事費用由省文獻會負擔，期加速目錄編纂作業。雙方進行溝通至下午六時，迄未取得結論。佐保所長乃提議請省文獻會研議回覆，始結束冗長的討論。

陸、後記

七月六日上午離開名古屋東急大飯店，中京大學社科所派遣檜山幸夫教授、東山京子小姐送行到名古屋車站，於此處乘坐新幹線電車，再轉近畿鐵道電車赴關西機場，付出昂貴機場使用費後，始搭乘長榮班機返抵國門。

中京大學社科所在回國後，送來修正後條文新版本，以及沿用八十六年合作協議書內容，但另外訂立備忘錄，就目錄出版經費、出版卷數另作規定。對此省文獻會仍一本當初立場，不同意更改，但爲表示合作誠意，特函請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請給與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給補助，副本傳真通知該研究所。社科所方面，終

於在七月二十五日召開全體所員會議，決議通過在八月八日和省文獻會續約。八月初，一如往年中京學術訪問團再度蒞會進行「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的編纂作業。八月七日下午佐保雅子所長、前川漸教授蒞臨省文獻會，對翌日續訂合作協議書進行最後的確認，八月八日上午十時十分舉行簽約儀式，十一時二十分圓滿完成換約。八月二十三日，在天理大學天理臺灣學會上認識，研究金門出身華僑在日發展情況的市川信愛先生來省文獻會，對省文獻會收藏資料有了具體瞭解後，預定在日後長期在此處查閱資料後改赴他處。另外同在天理大學天理臺灣學會認識的大川敬藏先生，則先後三次來信，詢問是否有其祖父經營「植松材木行」資料，經以日治時期臺北州出版圖書相關資料，以及光復後檔案中該材木行竹東支店、羅東支店提出之資產清冊內所列數字回覆後，表示有意撰寫祖父傳記，將來省文獻會查閱資料云云。其他在八、九月份，日本方面有大濱郁子小姐、蘆田東一先生、小侯喜久雄先生、大澤篤先生、山田敦先生、阿倍由理香小姐、宮畑加奈小姐來省文獻會查閱總督府檔案資料，在十月份則有北村嘉惠小姐、岡田真希子小姐預約來省文獻會查閱檔案資料。

柒、建議事項

一、省文獻會亟預加強研究體制。日本是個重視調查、研究的國家，如前文提及，在天理大學之內部即設有天理臺灣學會、天理南方研究會等以教師爲會員之研究性組織，中京大學亦設有類似之社會科學研究所。私立大學即已如此，經費較充裕之國立大學所設立之高層次研

究機構自是更多。例如本次因時間因素，並未進行拜會，只乘車經過之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東方研究所皆屬頗富盛譽之研究機構。而後者是大正時期京都大學取得外務省得自清廷庚子賠款之補助所設立。同一時期臺灣總督府欲申請該款以用於在華南的日籍學校，卻未能獲得許可，足見當時已有重視研究之風氣。省文獻會除收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這三種珍貴日治時期檔案外，配合精省業務，取得十二萬卷以上貴重原省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事業單位之檔案，包括所有日治時期、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以及民國五十七年以前之永久保存檔案。省文獻會人員允宜利用這一得天獨厚之先天條件，各自選定專題進行研究，亦可組成小組進行合作研究，甚至可考慮和外國人作更多層面的共同研究。

二、慎終追遠乃屬人類之天性，如在天理大學認識之大川敬藏先生，在得悉其祖父所經營木材行接收紀錄留在省文獻會後，即表示有空會來本會查閱是項資料，並且有意撰寫其祖父傳記。而在先前，因日本治臺時期有居住於基隆，自稱發現東沙島的西澤吉治氏，曾引發清廷、日本間的外交交涉。其曾任職日本NHK的孫子，也曾來省文獻會查閱檔案，發現了其祖父留下的紀錄，喜悅之情難以言喻。省文獻會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之人事部分檔案，不少是附有本人親筆履歷書者，相信這一部分的資料，在臺灣、日本並無正式外交

關係的今天，應是可作為推展臺日民間交流的重要資料。

三、天理大學臺灣學會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欲參加者皆須繳出席費，如此可以減少主辦單位的負擔。而對於參加人員，須住宿者，天理大學因食宿設備完善，足應所需，但也須繳交其規定費用。上述二點省文獻會似可參考效法。尤其提供食宿一項，久為來臺灣歷史文化園區查閱資料者所深感困擾之事項，實應設法改進。

四、在愛知縣公文書館、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為了普及公文書館制度，並促進利用館藏資料，都有展出館藏資料的制度，分為常設展示及企畫展示兩種，前者屬一般性展示，後者屬專題性展示，且有一定的期限限制。省文獻會收藏日治時期近三萬卷檔案及行政長官公署、一九六八年以前省府所屬機關、學校、事業單位永久保存檔案，館藏檔案豐富，實可參考本項制度，闢專區辦理常設展示，並配合各項活動，辦理專題性，且有時限之特別展示。

五、愛知縣廳在一九三八年輕率決定銷毀多數行政文書，所幸並未如我國不是焚毀就是送交製紙工廠，而不能補救。在數十年後仍可花費鉅款，先攝微縮影捲，再印出製作複製本。為了留下當代行政資料，亟應儘速建立不讓公文書輕易被銷毀之制度。

六、日本公文書館之統計資料顯示，各界諮詢案件有明顯增多現象，省文獻會亦有相同情形。而且因省文獻會收藏檔案數量多，且來源多樣，為讓遠方來的利用者，在最短時間找得所需資料，除需加強研究各類檔案狀況、

撰寫介紹文章外，亦應培養提供諮詢服務之兼職或專職人員。

七、日本公私機構，包括大學研究機構、宮內廳及民間神社、寺廟現仍保存諸多傳世文物資料，反觀我國除故宮博物院這類特殊機構外，較少傳世文物留存，反而以挖掘出土文物為多，顯示日本文物保存技術有其優秀、獨特的一面。對於省文獻會收藏之日治時期檔案、諸多省府移交原總督府使用餐具、漆器等物品，要做好維護、保存作業，允宜招請日本方面專才人員，來省文獻會實地瞭解情況，因地制宜，設法作好保存工作，或派遣管理人員赴日本研習相關知識。

八、日本國內在東京之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外交史料館、東京都公文書館都收藏諸多日治時期臺灣

史公私文書，甚至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內，亦收藏著擔任過總督府民政長官、總務長官之職達十年以上之下村宏氏文書，其他如山口縣公文書館、沖繩縣公文書館等地方檔案館都應收藏有臺灣史資料，實應設法取得，以充實省文獻會管藏，除便利利用者外，亦可間接提升臺灣史之研究層次。

作者簡介

姓名：陳文添

學歷：日本九州大學文學碩士

經歷：曾任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譯

現任：臺灣省文獻員會研究員